2022年12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:赵润琴 美术编辑:卞锐 TIANJINDAILY 天津日报

孟子

高扬的仁政理想和昂扬的大丈夫精神,是孟子区别于其他诸子最明显的特点。执着地以大丈夫精神倡行仁政理想,则是孟子一以贯之的人生轨迹。孟子自己做大丈夫,也热诚地教人做大丈夫。

做大丈夫 养浩然之气

刘隆有

不卑不亢 固守独立人格

非常之人,方能行非常之事。特别是以一介寒士,说服独霸一方、傲然人上、一贯视民众为奴仆的诸侯,施行普利民众的仁政,难度之大,可以想见,必须具有踔厉超迈之志,一往无前之慨者,方可明知其难而奋力为之。孟子能在仁政倡行史上开篇即大书一笔,全赖其令人敬佩的大丈夫精神。

其时,纵横家张仪、公孙衍正大行其道,常以合纵连横之术,挑起各国之间的战争,以之为自己谋取权位和富贵。一个叫景春的人,很羡慕张仪和公孙衍,在孟子面前为之标榜:"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?一怒而诸侯惧,安居而天下熄。"孟子却对之嗤之以鼻:为求一己之私利,而煽天下之杀伐,怎么能算得上"大丈夫"!"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,与民由之;不得志,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。此之谓大丈夫。"崇尚仁德,以之为"广居";遵守礼仪,以之为"正位";弘扬正义,以之为"大道"。得志的时候,和百姓一起追求仁政,不得志的时候,也要固守做人的节操。富贵不放纵,贫贱不自弃,威武吓不倒。如此,才称得上"大丈夫"。这样的大丈夫,可顶天,可立地,可排除万难,倡仁政,"济斯民",消除战乱,促进天下统一,实现天下大同。

孟子用这种"大丈夫"观阅世阅人,电穿雷击,直探原形,让王侯将相身上那些威慑世俗的披挂一文不值,而将其在这些披挂里深藏的卑琐龌龊兜底揭出。

用大丈夫精神倡行仁政,持大丈夫观直面诸侯,是孟子独创的游说经验。孟子曰:"说大人则藐之,勿视其巍巍然。堂高数仞,榱题数尺,我得志弗为也。食前方丈,侍妾数百人,我得志弗为也。般乐饮酒,驱骋田猎,后车千乘,我得志弗为也。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,在我者皆古之制也,吾何畏彼哉?"游说诸侯,首先要在心理上藐视诸侯,诸侯虽位尊权大,但我看人看志,志高则为大丈夫,志卑则为贱丈夫。一个人在其自以为"得志"之时的所作所为,最能看出其志之高卑,既然在这方面我远高于诸侯,我就理所当然可以在心理上卑视诸侯,精神上以正气慑之,论辩中以正论服之,以直言揭之。

一次,孟子向齐宣王讲王政(即仁政),齐宣王听后赞叹:"善哉言乎!"孟子知道,这只是礼节性的应对,压根儿没有施行的意思。于是径直敦促:"王如善之,则何为不行?"逼得这位堂堂大国之君慌不择言,竟然连连拿"寡人有疾,寡人好货""寡人有疾,寡人好色"这样的言辞来推诿搪塞,将其下流肮脏的人生追求和低贱丑陋的人格品位自曝尽净。令人读来,直呼快哉!又一次,孟子问齐宣王,假如您有个臣子要出国,行前将家事托付给友人,友人答应了却不当回事,您的臣子回来后,该怎样对待这个友人?齐宣王张口就答:与之绝交。孟子又问:您的官员管不好下属,您将怎么办?齐宣王答得更快:罢他的官!孟子紧问:国家没治好,该咋办?齐宣王不傻,该让贤啊!但这样的答卷只能深藏自己心底,岂敢公之于世?只好装疯卖傻,"顾左右而言他"。令人读来,不得不又呼快哉!

臣民见君王,从来都是顶礼膜拜,诚惶诚恐,低眉顺眼,媚态尽呈。连至圣孔子也如此,以至"人以为谄也"。鲁定公问孔子,君臣相互间应如何对待,孔子答:"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"孟子则不。主张君臣平等相待,臣不仅可与君抗礼,还可于初见即煞其淫威,更可以牙还牙,绝不以德报怨。孟子明告齐宣王:"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雠。"

《荀子·大略》载:"孟子三见宣王不言事。门人曰:'曷为三遇齐王而不言事?'孟子曰:'吾先攻其邪心。'"孟子知道:"枉己者,未有能直人者也。"只有固守"大丈夫"人格,才能逼令君王稍敛骄横,对自己敬以"大丈夫"之尊。齐宣王很快就范,对孟子礼敬有加,奉为客卿,位尊禄厚,不时请教,孟子也尽心待之。但即便这样,齐王略有失礼,孟子仍立马对等回敬,不假半点情面。

一次,孟子正准备去朝见齐王,齐王不知,派使者来对孟子说,我本该来拜访你,但感冒了,不能见风。你若能来朝,我将带病上朝见你。孟子不高兴了,对使者说:不幸我也病了,不能到朝廷去。

第二天,孟子不顾学生劝阻,特意到一个大夫家去吊丧,好让齐王知道,自己好着呢,昨天说生病,不过是借口,是要和你抗礼呢!孟子出门不久,齐王派的问病使者、看病医生就来了。孟子家人一面应付使者,说孟子已往朝廷去了,一面悄悄派人去告诉孟子。

孟子得知后,依旧不到朝廷去,晚上干脆住到一个友人家。友人批评孟子,说君臣关系,"人之大伦也"。齐王这样尊敬你,你呢,"未见所以敬王也"。孟子反驳道:"大有为之君,必有所不召之臣。欲有谋焉,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不如是,不足与有为也。"齐王若想大有作为,遇事应亲自来拜访我,和我商量,而不是派人来召我去。他不这样,我也不足以和他有所作为。

《韩诗外传》记:孟子游说齐宣王,齐宣王"不悦"其说,孟子对淳于髡慨叹:"吞舟之鱼不居潜泽,度量之士不居污世。"你"不悦"我,理所当然,我也"不悦"你。你有你的"巍巍"高位,我有我的独立人格,于是离开了齐国。

居仁由义 善养浩然之气

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,在人生修为上,先生最擅长的是什么?孟子答:"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"这种气"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",这种气伟大刚强,用正义培育它,一点也不伤害它,就会充满天地之间。这种气必须"配义与道",同义和道配合,不这样就没有力量了。这种气"是集义所生者,非义袭而取之也",是经常性的正义之举催生凝聚形成的,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获得的。"行有不慊于心,则馁矣",做一次亏心事就不行了。坚持以正义培育和发挥大勇,像曾子教导的那样,遇事反躬自问,正义若不在我,对方即便是卑贱之人,我也不恐吓他;正义确实在我,对方"虽千万人,吾往矣"。

这样的道理,孟子不仅常给自己的学生讲,游历诸国时,也常以之开导人、教育人,以提升各国有志之士的思想境界和人格品位。

齐国有个名叫垫的王子问孟子:士是干什么的?孟子答:士是追求高尚志向的。王子垫又问:怎样就是追求高尚志向了?孟子答:"仁义而已矣。杀一无罪,非仁也。非其有而取之,非义也。居恶在?仁是也。路恶在?义是也。居仁由义,大人之事备矣。"孟子强调,志向高尚之人,应当以仁为住所,拿义当道路。这样居住于仁,行走由义,一个大丈夫的人生修为便齐备了。有这样修为的人,胸中被浩然之气充实,那可就进入人生最高审美境界了。因为"充实之谓美,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,大而化之之谓圣,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"啊!

宋勾践想像孟子一样游说诸侯,孟子亲切地告诉他:"子好游乎?吾语子游。人知之亦嚣嚣;人不知亦嚣嚣。"你喜欢游说诸侯吗?那我就给你讲讲我游说的体会,不被理解,经常碰壁,对此要看得开,更要有自己的坚守,别人理解,当然高兴,不理解,也自得其乐。宋勾践问:这要怎样才做得到呢?孟子答,"尊德乐义",就无往而不自得其乐了。"故士穷不失义,达不离道。穷不失义,故士得己焉;达不离道,故民不失望焉。古之人,得志,泽加于民;不得志,修身见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。"诚能如此,岂有不乐!

孟子讲:居仁由义,可育浩然之气,可得人生之乐,还能让人修为得如同古圣中最伟大的尧舜一般优秀。曹君的兄弟曹交听说后,不敢相信,专程跑到邹国问孟子,"人皆可以为尧、舜",有这话吗?孟子答:"有啊。"曹交问:我听说周文王身高十尺、商汤身高九尺。我身高九尺四寸多,却只会吃饭而已,要怎样才能像古圣先贤那样优秀呢?孟子见他问得浅薄可笑,衣着举止也不合礼仪,起点很低,就诱导他从具体而微的日常小事做起。先鼓励曹交:没关系,"亦为之而已矣",只要做,就可以。继而用最浅显的道理开导他:比如说走路,谁不会呢?但是,慢点走,等长者走在前,就叫"悌";走得很快,抢在长者前,就不叫"悌"。所谓"尧舜之道",不过孝悌罢了。再留心一下衣着、言谈、做事,像尧一样得体、文明、合礼,你就"是尧而已矣"。相反,倘若衣着、言谈、做事,都像桀一样恶俗、粗野、乱来,你就"是桀而已矣"。

孟子说:"人有恒言,皆曰'天下国家'。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。"孟子多么希望人皆如尧舜,毛泽东也希望"神州尽舜尧",诚能如此,"本立而道生",充沛的浩然之气、昂扬的大丈夫精神,必将加速我们家国复兴之梦实现的步伐。

效舜与孔 勇担天降大任

孟子"尚友",在家乡,"友一乡之善士";在故国邹,"友一国之善士";周游天下,"友天下之善士"。又"友"古圣先贤,精研其著作,熟悉其为人,并进而探讨其所处时代。高瞻远瞩,纵横古今,在他夐阔深邃的视野里,唯有真正的大丈夫方能担当天下大任,而"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"。

孟子例举多位先贤的事例,论证这个观点。通观《孟子》全书,孟子最为心仪的,则莫过舜和孔子。

较之《论语》,《孟子》行文颇为汪洋恣肆,挥洒随意,但全书也不过35300多字,却用了不少篇幅和文字写舜和孔子。古今人物,舜的名字出现最多:20多章,99次。孔子出现87次,居第二。《孟子》全书共七篇,第五篇《万章》集中讲著名历史人物,而以舜和孔子所占篇幅最大,章节最多。在其他六篇中,也常常或专章讲述、或倾情颂扬舜和孔子。孟子对尧也很崇拜,常常将尧与舜并提,"言必称尧舜",游说诸侯,自谓"非尧舜之道,不敢以陈于王前",《孟子》里,尧出现60次,居第三。其他古圣先贤名字出现的次数和被敬重的程度,更不能与舜和孔子攀比了。

舜本为东夷贫民,出生即遭不幸,父母偏执阴毒,小弟凶顽疯狂,三人联手多次谋害舜,必欲杀之而后快。舜却既孝且悌,"鸡鸣而起,孳孳为善",感而化之,处理好了家庭关系。又善与人同,常常舍己从人,乐于学人之善以为己善。"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,无非取于人者"。这时候,全国正遭特大水灾,洪水横流,泛滥于天下。五谷不登,凶兽逼人。主政的圣君帝尧,"举舜而敷治焉",肆虐多年的滔天洪灾终得平息。舜又"流共工于幽州,放驩兜于崇山,杀三苗于三危,殛鲧于羽山,四罪而天下咸服",表现出强大的施政能力。舜相尧二十八年,深得国人爱戴。尧崩,三年之丧毕,舜按惯例"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。天下诸侯朝觐者,不之尧之子而之舜;讼狱者,不之尧之子而之舜;讴歌者,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",舜乃秉承尧的叮嘱,而践天子之位。

孔子也是从最基层干起,扎扎实实,尽职尽责。"尝为委吏矣,曰:会计当而已矣。尝为乘田矣,曰:牛羊茁壮长而已矣。"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,终生为仁守道,"可以仕则仕,可以止则止,可以久则久,可以速则速",一皆以"道之行乎"为准。天赋圣智,如子贡和有若所赞:"见其礼而知其政,闻其乐而知其德。"所行之道,"由百世之后,等百世之王,莫之能违也"。在圣人之中,也是"出于其类,拔乎其萃,自生民以来,未有盛于孔子也"。

《孟子》对舜和孔子圣迹圣德的详尽记述、崇高评价,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,几乎全部采之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乃上古五位圣王的合纪,写舜的篇幅,竟是写黄帝等四帝篇幅的近两倍,占整个《五帝本纪》的近三分之二。而且,于黄帝等古帝,行文多用概述,于舜则详叙铺叙,并特别点明:"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。"显然,在太史公司马迁笔下,所谓《五帝本纪》,重点乃在舜本纪,华夏文明虽开端于黄帝,而规模备具,则自舜的"明德"始。《史记》立《世家》,本来专为记载诸侯历代世袭之事,"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"。孔子并无诸侯之位,《史记》也像诸侯一样为之立《孔子世家》,因其乃至圣,"为教化之主,又代有贤哲",学术世有传人,后嗣代有贤哲。为此,《史记》又在专为"叙列人臣事迹,令可传于后世"的《列传》一体中,特立《仲尼弟子列传》。

孟子不仅倾情颂舜颂孔,更虔诚学舜学孔。

孟子说:君子所忧者,"舜,人也,我,亦人也。舜为法于天下,可传于后世,我由未免为乡人也,是则可忧也"。舜是人,我也是人。舜能做天下楷模,长久影响后人。我却这样普通平常,不能大有作为,真叫人发愁啊!"忧之如何?如舜而已矣",像舜一样,"非仁无为也,非礼无行也"。人生修为到这地步,即便因此而遭横祸,"君子不患矣",也会泰然对之,没啥苦恼的。孟子说:孔子是"圣之时者也""集大成者也""金声而玉振之也"。他明确表示,对古代的圣人都很仰慕,"乃所愿,则学孔子也"。对自己因生之也晚,"未得为孔子徒也,予私淑诸人也",颇感遗憾。

孟子考察上古以来历史演进轨迹,发现一个规律:"五百年必有王者兴";一个现象:王者兴起之时,"其间必有名世者",圣王兴起安天下,必有圣贤之士辅佐之。安天下,圣王与圣贤之士,缺一不可。他说:尧舜治世,禹和皋陶佐之。五百余年后,汤起兴商,伊尹、莱朱佐之。再经五百余年,文王奋起兴周,太公望、散宜生佐之。文王之后五百余年,到孔子之时,有旷古未见之圣贤,却无尧、舜和商汤、文王那样的圣君,所以天下大乱,不得平息。孟子不禁感慨万千:"由孔子而来至于今,百有余岁,去圣人之世,若此其未远也;近圣人之居,若此其甚也,然而无有乎尔,则亦无有乎耳!"孔子奔波终生,谋安天下,不遇而逝。我离孔圣去世才一百多年,离孔圣的家乡又这样近,我难道就不能继承孔圣的遗志,实现孔圣的理想吗?

通读《孟子》,不难发现:孟子本是以当代孔子自居的,自负有孔子之志、孔子之识。他以大丈夫气吞万里之慨,像孔子一样,周游列国,幻想得遇舜一样的圣君,佐其行仁政,倡王道,安天下。但一路游去,竟一无所遇。好不容易一度得到齐宣王礼遇,任之以卿相,谋之以国政,但也不过借之妆点一下场面而已,实则一无所行。孟子迫不得已,效孔子当年辞官以警悟鲁君的做法,辞去卿相之职,离开齐国都城,住到昼县,试图以此警悟齐宣王重视并采纳他的政见。孟子在昼县连住三夜,一直盼着齐宣王改变态度,挽留他,重用他,"王如用予,则岂徒齐民安,天下之民举安。王庶几改之"。但连等三宿,王廷竟音讯全无,孟子只好失望地离开齐国。路上,弟子充虞问他:先生是不高兴吗?孟子感慨道:"五百年必有王者兴,其间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来,七百有余岁矣。以其数则过矣,以其时考之则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;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?吾何为不豫哉!"

离齐之时,孟子年事已高,但壮志犹在,周游列国既然难遇,他就回到家乡,"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,述仲尼之意,作《孟子》七篇",将他的仁政理想、王道设计、浩然之气、大丈夫精神和学孔心得,著之简册,昭之后世,以呼唤和激励千秋万代的志士仁人,为家国祥和、天下安定而接力奋斗。

人生的结局 取决于态度和选择

晏建怀

历史上,很多名重一时的英雄豪杰,在面临同一抉择中,往往在态度和处理方式上不一样。正因为在态度和处理方式上的不同,从而导致了结局的霄壤之别。比如,刘邦、项羽先后进入秦都咸阳后,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,因而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先入咸阳的刘邦,开始也被秦宫的奢华和宫中美女迷乱了眼睛,但在樊哙、张良的先后劝说下,虽确有些恋恋不舍,但还是毅然离开了秦宫,并与秦中百姓"约法三章",然后还军灞上,所部对秦朝府库、宫室、美女弗取不扰,对关内百姓亦秋毫无犯。

而楚霸王项羽呢?司马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说:"项羽引兵西屠咸阳,杀秦降王子婴,烧秦宫室,火三月不灭;收其货宝妇女而东。"

等于是刘邦将咸阳完好无损地交给项羽,而项羽进入咸阳,却屠城、杀降、烧宫室、抢珠宝、掳妇女,可谓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最后呢?刘邦夺取了天下,项羽则自刎于乌江。态度不一样,结局就不一样,此为一例。

对于衣锦还乡亦是。项羽和刘邦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,其态度也不尽相同,一个稳妥,一个孟浪。进入咸阳后,有人以"关中阻山河四塞,地肥饶,可都以霸"劝说项羽定都关中,建议他依靠关中的天时地利,成就霸业。定都关中,以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,和沃野千里、良田万顷的资源优势,足以傲视山东、一统天下,对于项羽来说,确为上策。

但是,项羽拒绝了这个不失为良策的建议,他拒绝的理由竟然是:"富贵不归故乡,如衣绣夜行,谁知之者!"

扫平咸阳,便以为富贵到手。殊不知秦虽灭亡,但诸侯仍虎视眈眈,争斗不已,四方未定,天下随时可重新洗牌,在这种关键时刻却急于衣锦还乡,怎么看都有些小人得志的嘴脸,必然坐失良机。果然,他前脚"衣锦还乡",刘邦后脚就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、还定三秦,与他争雄天下了。所以,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,就是衣锦还乡太早了,缺乏定力,更无远见。

那么,胜利者刘邦就不屑于衣锦还乡了吗?非也,刘邦也盼望着衣锦还乡的光荣。然而,我们可以通过刘邦的时间表,来看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衣锦还乡的。

汉元年(前206年),项羽分封天下十九国,自封西楚霸王,然后就沾沾自喜地衣锦还乡了。也正是这一年,刘邦被封为汉王,也到达了人生的一个高峰,也已然"富贵",但他却没有沾沾自喜,更没有衣锦还乡。

汉五年,刘邦打败项羽,即皇帝位,实现了至高的人生理想,这时,他没有还乡;汉五年十月,刘邦亲征,灭燕王臧荼,未还乡;汉十年,亲征陈烯,平定叛乱,未还乡;汉十一年,北击匈奴,剿灭韩王信,未还乡;同年,杀淮阴侯韩信,夷其三族,诛梁王彭越,夷其三族,未还乡;汉十二年,淮南王英布反叛,刘邦带病亲征,大败英布的淮南军,英布仅带领百余人逃走,刘邦安排别将追击,自己得胜而归。

至此,那些曾经给刘邦造成压力的异姓王,基本被剪除殆尽。于是,在亲征淮南回来,刘邦就顺路回到了沛县老家,一行骑从杂沓,车服鲜华,戈甲耀日,旌旗蔽天,真正热热闹闹地"衣锦还乡"了。

家乡父老听说当了皇帝的刘邦荣归故里,无论男女老幼,纷纷拥挤到大街上,争睹圣颜,可谓摩肩接踵,盛况空前。地方官开宴置酒,欢迎皇帝。刘邦邀请乡亲故交,衔酒相乐。酒过三巡,刘邦很激动,亲自击筑,随口吟唱出一首《大风歌》,歌曰:"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!"

之后,刘邦与家乡父老一起聚饮十余日,才打算回长安。乡亲们再三挽留,又喝了三天。大家围绕在刘邦身边,如众星捧月,刘邦十分感动。一高兴,刘邦又免去了沛县和丰邑的赋役,父老更是感恩戴德,山呼万岁。

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衣锦还乡,而项羽却无法实现。他之所以无法实现,是他对衣锦还乡概念的理解,没有刘邦的深刻和透彻。衣锦还乡,只能是在劲敌已除、威胁已消、四海已定、江山已稳之时。像项羽那样目光短浅、行事操切,连自己的地盘和性命都保不住,又怎么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衣锦还乡呢?

大志与小道

清风慕竹

东汉灵帝刘宏是个文艺青年,"善鼓琴,吹洞箫",又好文学,曾创作了《皇羲篇》五十章,以及《追德赋》《令仪颂》《招商歌》等作品。登基当了皇帝之后,他把这些雅好又带进了政治生活中。

灵帝在太学之外,又创办了鸿都门学,地点在皇宫。他从各地的学校中选拔了一批具有撰写文赋才能的人,进入鸿都门下,享受"待召"的待遇,诗赋写得好,就可以直接当官进入政界了。后来又征召了一些能写公文书信以及擅长写鸟篆书(一种装饰字体)的人,人数逐渐达到数十人。侍中祭酒(鸿都门学的校长)乐松和贾护深知灵帝的性情,趁机招引了一些德行低下、趋炎附势之徒混杂其间,灵帝来参加文艺沙龙时,这些人时常讲些民间街巷趣事,深锁宫中的皇帝闻所未闻,听了十分开心。因此,这些人常常能够得到破格提拔。

灵帝的这些所为,让一些有责任感的大臣不免忧心忡忡。借着灵帝下诏征集治政意见的机会,大儒蔡邕写了密奏,劝谏说:"古代取士,一定要让各诸侯国定期举荐。到我孝武皇帝(汉武帝刘彻)年间,开始通过设置贤良、文学等科目,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,因此名臣辈出,文武并兴。汉朝选人用人,无外乎这几个主要渠道。至于书画辞赋,都是小才小技,对于匡国治政没有什么用处。陛下您刚刚继位,首先应该学习儒家经典,在处理政事之余,观览辞赋,不过是用以替代博弈游戏的休闲而已,不应作为取士教化的依据。当年孝宣皇帝(汉宣帝刘询)在石渠大会诸儒,章帝(汉章帝刘炟)于白虎集会学士,统一对四书五经进行阐释,辩驳含义,这正是周文王、周武王的治国之道,应该依从。那些小能小善,虽然也有可观之处,孔子认为,走远了就行不通,君子应该立大志、走大道。"

蔡邕的建议可谓一语中的,可惜以灵帝的见识和格局,完全听不懂,否则他也不会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昏庸皇帝,以致诸葛亮在他的《出师表》里感叹:"亲贤臣,远小人,此先汉所以兴隆也;亲小人,远贤臣,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,每与臣论此事,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、灵也。"

喜欢诗词歌赋甚至鼓琴吹箫照理说并不是错,灵帝之误在于他拥有一个皇帝的身份,这决定了他的职责是修明政治,管理好国家,所以他读书的首要问题,是弄清治国的大道理,而不是沉迷于诗赋的小爱好。

因此,蔡邕才引述《论语》里的观点,"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,致远恐泥,是以君子不为也",意思是说,即使是小技艺,也一定有可取之处,但执着钻研这些小技艺,恐怕会妨碍从事远大的事业,所以君子不做这些事。对于大志与小道,朱熹解释得更明白,他说:小道,如农圃医卜之属。这些小道,也有大的价值,有其可观之处。只是对于怀抱天下,志在大济苍生的君子来说,政治是关系到整个社会、国家的大事,所以不能为小道所拘泥。

想想看,历史上那些为雅好所耽误的帝王,如南唐后主李煜、北宋徽宗赵佶、唐玄宗李隆基,哪个不是顶尖的艺术家,可惜都为小道而丧失了大志,弄得国败家亡,百姓跟着饱受流离之苦。

人之于世,各具职责,不为枝节所牵绊,始终不忘初心,才能避免走上偏路、弯路甚至邪路,从而更好地抵达目的地。

历史随笔